

《彼得·孟迪遊記》(1637)

中的變化性意義

對遠東英葡關係研究的貢獻

普 卡*

日記通過表現特殊世界中生命個性的文字、具體的形象及其聯繫，闡述個人對世間萬物的理解。

——哈瑞·伯洛蓋特：《女性的世紀：英國婦女日記》(1989，頁7.)

葡萄牙人在澳門定居(1557)之後不久，歐洲各種船隻便開始在當時中央帝國中唯一的歐洲人碼頭——澳門碼頭或附近的水域停泊，英國人也不例外。17世紀上半葉，除其它船隊之外⁽¹⁾，在葡萄牙和英國於1635年⁽²⁾在果阿簽署了休戰協定之後，一支英國船隊訪問了“上帝聖名之城”。1637年6月27日，在“霍爾木茲的維克多”⁽³⁾威德爾(John Weddell)的統帥下，四艘英國船經果阿來到澳門⁽⁴⁾，停泊在澳門南面的島嶼附近，同船而來的還有來自馬六甲的耶穌會傳教士。據奧斯汀·科茨(Austin Coates)說，這是“英國對中國進行的第一次商業旅行”。威廉·科提恩(William Courteen)⁽⁵⁾先生的船隊是於1636年4月離開英國的，而彼得·孟迪⁽⁶⁾當時就在船隊的一艘船上。這位英國旅行家在他的旅行日記裡對17世紀⁽⁷⁾的澳門有長篇記述⁽⁸⁾，並配有這座城市的幾幅圖畫。在他的描述中，澳門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存的地方。日記⁽⁹⁾記錄了孟迪無數次歐洲和亞洲之行，其記述和內容受到歷史社會背景的影響，而這些正是作者旅行的動機和興趣所在。作者還對相當遙遠的葡萄牙飛地的生活、風俗、建築及其感興趣的方面加以描述。

在旅行的最後，旅行家——“紅夷”⁽¹⁰⁾——於6月28日登上陸地，以便將國王查理二世的一封信交給議事廳和兵頭多明我(D. Domingos da Câmara Noronha)。會講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在東方的

“通用語”——的孟迪、約翰·芒特尼(John Mountney)和同樣懂葡萄牙語的翻譯托馬斯·羅賓森(Thomas Robinson)⁽¹¹⁾被邀請到一個耶穌會修道院⁽¹²⁾赴午宴。這次訪問是在耶穌會聖母學院的昇

* Rogério Miguel Puga, 葡萄牙里斯本高等科技教育學院教師, 里斯本新大學英葡研究專業碩士, 英葡研究中心、里斯本新大學人文科學院海外歷史中心以及里斯本大學文學院葡萄牙擴張時期文學中心研究員。

天聖母堂那莊嚴的前壁建成兩年以後。旅行家描述了他們一行在澳門受到的接待：“（我們）受到了禮貌的接待並作出了在第二天還禮的承諾。”⁽¹³⁾

不論進入或者離開這個城市，英國人都受到了鳴炮的禮遇。孟迪說，在那兩次經歷中他曾到過兩個炮臺——伽思蘭炮臺（頁59）和娘媽角炮臺（第65頁）——這對於瞭解當時這座城市在英國船員看來是有多么堅固甚至難以企及不能不說是具有意義和象徵性的，因為炮臺象徵著葡萄牙人在澳門的權力和力量，而作者在他訪問澳門之後很久還再次提到“澳門有許多城堡和炮臺”⁽¹⁴⁾：“澳門這座城市有許多城堡、炮臺、要塞等等，防衛森嚴，市民和為數不少的黑奴得到充足的彈藥。在我看來，這是個強大的城市，儘管如此，荷蘭人時刻在等待時機把他們（葡人）和其它人從這裡趕走。”⁽¹⁵⁾

表示程度的副詞（“許多”）同樣具有象徵意義，由於英國人認為這座城市似乎防衛嚴密並且不乏威嚴的建築，炮臺總是和城市景觀融為一體，不論對統治者還是對來訪者都具有極大的象徵性。⁽¹⁶⁾作者進一步表明本地的防衛針對的可能是荷蘭人的威脅，同時還介紹了造成英國船隊進入澳門被推遲到日本船隊離開之後的經濟政治局勢。⁽¹⁷⁾

孟迪這次對澳門的訪問是在威德爾決定7月29日沿珠江而上去廣州直接與中國人做生意⁽¹⁸⁾之前。中國人與葡人一樣希望英國人離中國海岸越遠越好，因為不論從當時葡人在這一地區具有的優勢還是從前往長崎的海上航線來說，最重要的是希望穩定和安全。7月29日，面對現實的英國船隊決定離開澳門，轉而直接與中國居民接觸，耶穌會修士給他們提供了旅行所需的給養，他們還與從他們那裡買酒的葡人進行了一些交易。⁽¹⁹⁾出發之後，孟迪描述了中國快捷的帆船和其它船隻，並且為他所描述的船隻附上了詳細的圖畫。他同時承認，面對陌生的和不明意圖的當地陸上和海上居民，船隊感到害怕和擔憂。隨着遠離澳門，英國人與家人失去了聯繫，兩個民族在早期的接觸中發生的必然困難變得更加明顯和沉重。然而這片飛地對於歐洲旅行家來說的確是一個安全港，生活在這個拓居地的葡萄牙居民

提供給異國人士所熟悉的安全，不論是傳教士還是商人都在保護着自己的宗教和經濟利益。

9月，中國當局建議該市政府將英國人從“虎門”地區驅逐回澳門。在這裡孟迪已經租了一所房子從事一些規模有限的貿易活動。當時回到城市的威德爾承認違犯了中國和葡萄牙法律。但是，痛苦還沒有結束。11月一個來自日本的船隊帶來了一群逃避宗教迫害的基督教難民⁽²⁰⁾，他們要求威德爾帶他們去更西面的地區。威德爾同意他們的請求，這引起了葡萄牙當局不快，命令英國人離開城市。於是在到達澳門六個月之後，英國人離開澳門前往印度，於1638年⁽²¹⁾1月到達歐洲，準確地說，到達多佛。

彼得·孟迪的記述完成於澳門那個因與日本的貿易而輝煌的時代結束之前。在他的記述中，這位英國旅行家向讀者⁽²²⁾介紹了他所見到的在建築和各種生活方式方面如萬花筒般的17世紀的澳門。在這部作品中，除了飛地那些多彩多姿令人驚歎和獨特的景觀之外，人文方面的異國情調也隨處可見。它是17世紀從一個英國旅行家的角度反映澳門的城市形象、一個多種文化融合的世界以及葡萄牙在這個地區存在的唯一記錄，而且對於研究英葡在東方即在澳門⁽²³⁾的關係來說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件。他的記錄具有與（1635）安東尼奧·博卡羅（António Bocarro）和（1838）馬可·達瓦羅（Marco D'Avaló）的記錄不同的意義，更多地記錄了澳門受到日本和其它民族影響的多元文化下的生活方式。

我們可以將這種異國情調定義為“另一種文明及其獨特性的代表”⁽²⁴⁾。正如 exotismo 這個詞本身的前綴所表達的那樣，作為對變化性的解釋，異國情調意味着西方文化中“我”的目光及其涵義的變化，即在彼得·孟迪遊記中的“偏離”。改變世界的觀點使得“我”認識到，在一個“互動式閱讀”的過程中，自己也是“另類”。異國情調，這種對不同文明相遇所作的具代表性的比喻，表現為一個屬於社會文化範疇的特性問題；一個實踐和直覺的問題。一張能夠反射出那些賴以展示人的感知、作品所具有的歷史-文化內涵及其後來反響的各

種藝術表現手法的平面鏡，一個與“我”對“另類”的態度密切相關的現象，正如從一個外部觀察者的眼睛所看到的不斷變化的“現實”中出現的鉛版和拓片要證明的那樣。對異域的關注和“另類”的視點就這樣與描述者和評論者的觀點聯繫在一起。(描述)記錄或者神化其他民族的出發點、觀點和興趣對於像歐洲人的目的地和興趣一樣變化多端的形象塑造來說具有決定意義。中國和日本的形象——這些以與非洲或者南美洲不同的方式“找到”和(描述)記錄的國家——與已經被歐洲國家殖民化的地區的形象十分不同。因此，愛德華·賽伊德(Edward Said)在他的引起爭議的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²⁵⁾中提出了這樣的理論，即從某種文學意義上說東方是西方的一個發明。

在日記裡，孟迪以驚奇和贊美的筆調提到並描述了三巴堂的屋頂和直到今天仍然是澳門城市象徵之一的三巴堂前壁，以及當地的水果和異域的事物，為此，他運用了“這裡”和“那裡”之間、有時還在彼此不同的異域民族⁽²⁶⁾之間進行比較。談到在澳門的第一天及其飲食，他說：

早餐中，一種叫荔枝的水果，它大小如核桃，深紅色並有硬皮，粗糙的皮像覆盆子或桑葚(……)，味道像西班牙一些鄉間別墅的庭院裡的葡萄”(……)。它們祇產於這個中華帝國。我個人看來，它是一種我從沒有吃過或嚐過的美麗而好吃的水果。⁽²⁷⁾

接下來，作者描述了這個地區的一种植物和一種動物，即“一種奇怪的植物”和“一種漂亮的魚”：

城市的這邊和那邊有一些樹和一些小花園，但是，他們在家裡設置許多花廊和露台(以及)一些矮小的樹木、植物、花等等。早餐時，一種(在這裡很普通的)生長在岩石或石頭中的小樹，它們被栽在盆或其他容器中。在這些盆中，他們養着一些像人的小手指那樣大小的小魚，(……)它們都來自Cantan

(……)。我把樹和魚帶到船上交給長官(威德爾)，但是，由於沒有得到應有的照看，它們在幾天之內全都死了……⁽²⁸⁾

幾乎是在關於澳門的描述的最後部分，作者介紹了這裡生長的一種豆類(“和我們的一樣”)，說：“……通過這些人可以看到氣候改變了植物的形態等等(以及其它)生物……”⁽²⁹⁾經驗也是葡萄牙大發現的一個結果，並不斷被新的發現所豐富，正像路易斯·德·卡蒙斯在孟迪訪問澳門之前六百年在《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所說的那樣：“祇有閱歷才能凝結成智慧”(第4章第94段)和“我親眼看得那麼真切”(第5章第18段)。⁽³⁰⁾

在第一天的訪問中，孟迪的目光留連於“聖保祿教堂”：

教堂的屋頂連着(被稱為聖保祿的)學院，它是一個在我的記憶中從未見過的美麗建築，工藝精美。它不是中國風格的建築，鑲嵌在木頭中，塗着奇特的顏色例如朱紅色、青色等等，(……)而且教堂有一個新的美麗的前壁，通過許多臺階可以登上它寬大的斜坡……⁽³¹⁾

旅行家瞭解自己眼前之物的價值和獨特性，他借用讀者所熟悉的歐洲參照物記錄了這座建築的美麗，以便讀者們能夠瞭解澳門的多樣性。在這裡，不同的生活方式、觀點和感覺交織在一起，將地理環境和中國南方的情況與他到過的其它異域風光和英國的Moorstones地區相比較：

澳門位於依山伸展出一片土地的一端，房屋周圍有一些花園和樹木，那裡的風光令人想起果阿，但卻沒有後者那樣遼闊；他們的房屋為兩層並在外面再加一層用以抵禦每年發生的被稱做中國颱風的颶風或烈風，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他們沒有給教堂建築高高的鐘樓或尖塔。(……)從前，澳門有許多大小不等的或者無人居住的小島，大

部分沒有(……)許多大一點的島類似我們西部地區的某些被稱作Moorstones的地方……⁽³²⁾

作者顯然是從文化習俗和氣候因素方面說明澳門建築的特點，並同樣介紹了中國本地傳統。但是，在對讀者或各種藝術形式的鑒賞家所不熟悉的當地風光、居民、奇異的風俗習慣所作的描述中，地理距離仍然給人以“異域”的感覺。這種地方特色不可避免地為價值學的判斷留下了空間，並因此為從接近/相似和疏遠/差異的方面進行類比和比較提供了可能。在文中，同樣可以見到澳門的葡萄牙人在長期壟斷制度下對與日出帝國的鉅額貿易給予的重視，正因此，當局才禁止英國船隊在日本船隊離開之前進入本地區⁽³³⁾，說中國人不允許該城市與包括西班牙在內的其他國家進行貿易。澳門總督收到的上級——印度總督和“西班牙國王”，即葡萄牙的菲利普一世——命令也證明了這項禁令。中國人同樣對澳門附近海域出現的外國船隻感到不快。⁽³⁴⁾

英國船隊同當地中國人的接觸被葡萄牙人阻止了，“安妮號”(Anne)雙桅船被禁止與中國船隻進行貿易。在談到從他們的船隊旁經過的當地船隻時，孟迪再次表示了他對“異域美學”的吃驚。⁽³⁵⁾

“他們乘坐一艘大船，船上裝有鼓和銅鑼，他們有節奏地敲舐它們。他們的船上還有一些旗幡。”⁽³⁶⁾

孟迪較早發現葡萄牙人把他們的到來當作外來威脅的原因(“葡萄牙人不許我們開展貿易的原因”)：1)“……當日本船隊離開後，我們才能開始，旅行才得到來自本地陸地方面的支援”。2)

“……如果我們在這裡自由貿易，並且還與日本通航的話，他們就會衰敗……”⁽³⁷⁾ 3)“(彼得·孟迪認為葡萄牙人)從他們自己那方面來說，主要原因在於我們的到來會很快吞掉他們所有的貿易。”⁽³⁸⁾

在一些船員被中國囚禁後，回到澳門的作者是在英國船隊指揮官(威德爾海軍上將)、龍旗兵軍官克里斯托弗·帕爾(Christopher Parr)和一位基督教神父⁽³⁹⁾的陪同下訪問了這座城市。他們受到議事會的招待，來到一個“非常漂亮的陳設舐盤子、屏風、椅子、牙床和幔帳等物品的房子。屏風⁽⁴⁰⁾大約

八、九英尺高，有許多扇葉，其主要作用是將一個房子分成若干小間或者將它們合併，還可以放在牆邊起裝飾作用。它們儼然像一個極其令人愉快的展覽會，用金色繪出許多奇異圖案，包括故事、野獸、鳥、魚、森林、花、水果等等。它們一般分成兩組，每組包括八扇或幅，每八扇一套，價值可達一百里亞爾(Ryall)，有的多有的少。”⁽⁴¹⁾

作者還描述了中國人奇特的寫字方式：

在那個裝墨的(家什)裡，一邊裝黑色，另一邊裝紅色。他在兩個裝着水的小格裡浸筆並研磨(……)。一個發明[原文如此]用五個尖起的或嫩芽形狀的東西安放他的筆，以免弄髒地毯或桌子。⁽⁴²⁾

孟迪不但注意到並仔細描述了物品，也注意到當地人的習俗。在欣賞地方情調的時候，他還在日記的許多地方表現出對這種文明程度或範圍的關注，不論是在地域方面，還是在習俗方面。例如他這樣記敘了“在澳門的一次晚餐”：

我們用盤子進晚餐。我覺得非常好吃而且美味，祇是做法與我們的很不一樣。每個人得到份量相同的用兩個銀盤端來的各種食物。食物經常變化。當一個人吃某個食物時，另一個食物已經為他準備好了；這種情況幾乎貫穿了我們的整個晚餐。(……)葡萄牙酒好極了。而且還有同樣優美的歌曲和豎琴、吉他演奏。⁽⁴³⁾

孟迪還記錄了中國的一般服裝(“中國人的各種服裝”)⁽⁴⁴⁾。服裝是這座城市的文明的一個象徵符號，作者根據他在飛地的街上觀察到的服裝為我們描繪了一幅這一側面的生活圖畫。華麗、別樣和異國風情再一次出現在作者的筆下和畫中。在這裡，他將當地居民置於臺上，用繪畫記錄了中國的禮儀，並作了這樣的說明：

(已經)看見中國人例如前面提到的滿大

人所穿的各種衣服後，我就把在心裡記得的在澳門看到的幾種寫下來。(……)那些我們稱之為滿大人(Mandareenes，一個葡文詞)⁽⁴⁵⁾的人即發號施令的人，在他們的腰部佩帶着寬大的腰帶，在腰帶的前部和後部都有皇家的徽記，有的像一隻獅子的形象⁽⁴⁶⁾。除在特別場合外，他們通常不佩帶它們。因為同樣的聚會上，有時我看到的是N^o.A，有時是N^o.D或H。⁽⁴⁷⁾

在其它關於服裝的圖畫中，我們要強調某些具有異域服飾特點的方面：孟迪認為男孩頭上帶的奇特的頭巾具有女性特點：“……世界上沒有男人穿的外衣更像女人的了……”⁽⁴⁸⁾；婚禮上穿的衣服；不同年齡層的人有專門的髮型：“我看見許多年輕人和男孩屬於這種情況，但成年男子卻不是這樣，他們的一部分頭髮鬆散地垂在前額和腦袋上，其餘部分被向下紮起來”⁽⁴⁹⁾；街上，滿大人戴着遮陽帽；下層人（“下等人”）帶着小墊子以便在當權者面前下跪；還有在中國應當便宜的絲綢。⁽⁵⁰⁾通過服裝我們可以發現與每個社會和族群所承擔的社會角色相關的各社會-文化階層，例如各類型人和權力之間的關係。個人對某年齡段、社會和特權階層以及類型的從屬關係就這樣通過其舉止行為和特別的穿妖打扮反映出來。關於女性的服裝，孟迪說他不曾涉及，因為他沒有見過任何女性，“但窮一些的人及其它人差別很小。頭上的頭髮梳成同樣式樣，儘管頭髮很多。不論是富人還是窮人，我都沒有看見有男人在脖子上、胳膊上或耳朵上佩帶珠寶、項鏈等，也不佩帶武器。”⁽⁵¹⁾

再往後，有一章是關於“一名葡萄牙婦女在澳門”的內容。在這一章裡，孟迪寫道，中國的僕人是買來的，那些葡萄牙人的妻子是中國人或是“混血”⁽⁵²⁾。義大利旅行家馬可·達瓦羅⁽⁵²⁾在(1638)關於澳門的記述中也曾談到這個城市的混血現象。澳門的家長制社會中婦女行使權力的方式以及她們的社會和家庭地位都可以在孟迪⁽⁵⁴⁾的著作中找到記錄。孟迪承認：“毫無疑問，在這個國家，還有其他許多奇特的服裝。”⁽⁵⁵⁾在後來，他還

描述了中國人的相貌，並從美學價值的角度談到他對一個第一次見到的民族的認識：

他們大部分是小眼睛、寬嘴和扁鼻子，黝黑膚色使他們像生活在露天裡的人，即那些幾乎生活在北回歸線下的人（雖然他們中間也有許多端正有禮貌的人）。他們的鬍鬚很稀，頭髮不多但很長，我看這都是出於自然。另一些人把頭髮散下來，並保持那個樣子。我看到一些留大鬍子的人，但很少。⁽⁵⁶⁾

作者對中國人的鬍子感到奇怪，把它與歐洲人的鬍子進行比較。從東方到巴西，葡萄牙人的鬍子都是用來區別盧濟塔尼亞人的標誌，因此，15-17世紀的歐洲遊記作家才不無驚奇地記錄下那些沒有鬍子和體毛的人。

住在澳門議事會委員安東尼奧·奧利維拉·阿拉尼亞上尉⁽⁵⁷⁾家，作者還發現當地同時存在的不同習慣和文明/民族。他寫道：“談了離題太遠的中國人後，現在我們再回到澳門的葡萄牙人。”⁽⁵⁸⁾在這個家庭中，他見到：“三或四個漂亮的兒童，是前面提到的安東尼奧先生的女兒，她們美麗的面容和膚色，除了在英國⁽⁵⁹⁾，世界上沒人能媲美。(……)她們的衣着同樣使她們顯得美麗。她們的上衣像小的和服或日本上衣，也使她們看起來很美。”⁽⁶⁰⁾

因此，我們可以見到日本文化和奢華對這個飛地的影響。書中同樣也記錄了英國人在城市的街上見到的居住在澳門的日本人，並對當時的異國習俗例如使用紙巾表示奇怪：

在這個城市裡，我們看到少數日本人，大多數基督徒。那些不是基督徒的，在頭部前頂剃掉一半頭髮，其餘部分在後面紮成一個小髻，但很短。他們用隨身帶的一種柔軟但很結實的小塊紙擦鼻子，用後扔掉，很髒，用亞麻布手絹擦臉和手。⁽⁶¹⁾

關於日本更詳細的情況，對日出帝國瞭解很少

或根本不瞭解的孟迪向讀者推薦了另一位因遊記聞名的英國作家——珀切斯 (Samuel Purchas)⁽⁶²⁾，在他的書裡有曾經在日本居住過的英國人威廉·亞當 (William Adam) 的叙述，而且孟迪也可能提到過他的作品。

幾乎是在其作品的最後，孟迪用了幾個段落來描寫澳門的富人和婦女在公共場合和在家裡所穿的衣服，又回到了他已經描述過的內容。我們將其轉載如下是因為它們在民族學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它們反映了17世紀澳門日常生活的一個方面：

這裡有許多富人，他們穿袂葡萄牙式衣服。婦女的披肩或 (?和) lunghees 像果阿那個地方的人們那樣，一個帶在頭上，另一個從腰部到腳，戴着帽子。這是澳門婦女的普通衣袂。祇有較富有的人坐轎子，像倫敦的座輿，全身都蓋嚴實，價格很貴，是從日本帶來的。當她們不坐轎子時，太太小姐們和女僕們在外表上就分不出來了，她們全身都裹得嚴嚴的，不過，她們的披肩或 (?圍巾) 很好看。⁽⁶³⁾

在室內的時候，這些婦女穿一件帶袖子的肥大內衣，叫做日本和服，因為這是日本人平常穿的衣服。(……) 在她們的上衣和她們梳在頭頂的頭髮上，都根據能力的大小裝飾着珠寶玉石。這種裝束，穿起來很快，也很好看，別的人則要花費半天的時間。⁽⁶⁴⁾

在澳門居住的六個月裡，作者觀察了這個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她們的一些習慣，再次把這些習慣與歐洲人的習慣進行比較，將它們聯繫起來並加以 (解釋) 整理。他詳細記錄了自己以前從未見過的一種遊戲，那是一個星期天 (禮拜日，休閒日)，在遊戲中，“十五或十六個騎士和馬匹轉袂圈跑”，然後，還記錄了一個投球遊戲，“是西班牙常見的那種”⁽⁶⁵⁾，而且與英國的另一個遊戲相像。⁽⁶⁶⁾ 城市居民的另一些遊戲也有所描述 (“作為娛樂，澳門的葡萄牙人喜歡的那些遊戲”)：

(在) 他們的優美、寬大、堅固、富麗並且裝修得很好的屋子裡，他們穿戴都很闊綽的妻子和孩子們；他們的奴僕數目 (大部分頭戴帽子的男僕和中國女僕)；他們的聚會、節日和婚禮娛樂；基督教節日和假日 (經常有)；外面既沒有田地，也沒有花園，不准中國人進入。(……) 在他們的別墅裡，有漂亮的小船，很少像樣的房子，他們有時到附近島嶼的海灣或河流去，在一些河流旁美麗的小山谷裡與家人共渡八或十天 (……)，住在自己帶的帳篷裡，這裡有很多這樣的山谷。這就是住在這裡的葡萄牙人的娛樂。⁽⁶⁷⁾

在同一章裡，作者提到了澳門是從中國領土延伸出的並與之接壤的一小塊土地，特別指出“城牆和關闌就是針對它的”，它們將葡萄牙人/歐洲人和中國人分開：

從海邊到海邊約一半射程的地方有一堵牆，牆上有一道門或通道，由中國人守衛。葡萄牙人沒有特別許可證不准通行。凡是想從主人那裡逃跑的奴僕，祇要穿過那裡，他們就安全了，沒有人再遠追。這種事情還不少。(……) 在對葡萄牙人不滿意的情況下，這道門就關閉起來，中國人就切斷了他們的生計……⁽⁶⁸⁾

但是，避世和對綠色空間的需要使葡萄牙人很樂意去這片土地附近的小島，在那裡建立家庭營地並居住若干天。由此，作者談到一些水量豐富的小河，在去小島居住時，葡萄牙人可以從那裡取水喝。關於基本的食物：“這裡的各種供應品如麵包、肉、魚、水果等都很便宜。”⁽⁶⁹⁾ 關於當地的娛樂活動，旅行家提到耶穌會修士在澳門中國居民中講授教義。在〈中國人免費給普通老百姓演戲〉這一章中，作者描寫了在節日期間葡萄牙人的戲劇劇目和他們的大度之舉：

(1637) 11月12日，在西班牙大帆船船長住地前面（住地是屬於耶穌會修士的非常漂亮的房子）搭起了一個平臺或戲臺，中國男孩在上面演戲。對我們來說，他們的外表動作很好，孩子們也受到寵愛。他們的歌唱有點像印度歌，都是齊唱，用小鼓和銅製樂器打節拍。演出是在廣場對所有普通老百姓舉行的，完全免費。看來是有身份的人由於諸如婚禮慶典、生兒育女的祝賀等原因，自費舉辦這種演出，給普通人免費觀看。他們的演出也有成年男人參加。(70)

11月25日，海軍上將和英國船長們應邀上岸到三巴堂觀看一場演出。航行者們謝絕了邀請，因此祇有陸上的人看到了這場演出：

那是他們那有名氣的沙勿略(Saint Francisco Xavier)生活的一部分，有各種美妙的表演即孩子們穿着中式衣服跳中國舞，葡萄牙人和荷蘭人進行舞蹈比賽，荷蘭人輸了，但對於那個國家，並沒有責備的言辭和不文明的舉動。

另外一種叫大蟹舞，許多男孩巧妙地裝扮成蟹的樣子，就是通常被稱為板凳蟹的那種蟹，他們和樂器伴奏唱歌表演，彷彿他們就是一大群螃蟹。還有一個兒童舞，孩子們太小，看來幾乎不可能承擔這樣的表演（他們中的一些是否能走路或懂事頗值得懷疑），是故意挑選來引起贊揚的。(71)

我們見到的是以聖徒為題材的具有教學目的的舞蹈，因為某些基督教的觀點難以解釋或翻譯給澳門的華人，由此許多關於澳門的文章在提到三巴堂前壁時也稱其為“石頭的隱喻”(72)。連孟迪本人也將戲劇與耶穌會在中國孩子中間的傳教(72)聯繫在一起：

(……) 就像耶穌會修士教導他們的那樣，耶穌會修士不但以這種方式中也以其它教育方式

充當導師，有責任教養本城的年輕人和幼童，特別是有身份、有地位人家的孩子。(74)

在傳播教義的同時，葡萄牙人進行政治宣傳，以便贏得本城中國居民的最大尊敬並把荷蘭人當成他們的敵人。(75) 孟迪還描述了演員表演雜耍、穿妖華麗的孩子們的父母也參加演出、一個耶穌會修士擔任舞臺監督的情況，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演出的盛況。

1637年12月26日，在澳門這個無比忠誠的城市居住六個月並積累了見識之後，日記的作者寫道，總督宣佈英國人在當天晚上離開這個城市：

因此，他要在這個城市發佈一項公告，以便我們明白瞭解。(……) 在路上，我遇到他的一名軍官帶着他的信走向我們。他以最粗暴的態度、用不文明不禮貌的語言問我們是否知道我們身在哪里？是否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在西班牙國王的領地內？是否知道他是將軍？是否以為我們是在倫敦？胡亂稱我們是Picaros、Borachos、Traidores等，那是無賴、醉鬼、叛徒的意思，並讓我們從現在起就離開這裡回到船上去。如果他發現任何人在早晨登岸，他就要把這個人吊死，並把在城裡發現的貨物沒收。這樣，未等我說一句話，他就離我而去。(76)

孟迪認為引起不愉快的原因是英國船隊準備將澳門的一些人和商品（“財產”）(77) 運送到印度去。議事會以“他們接到來自廣東的一些新的公文，要求立刻讓我們離開”(78) 為理由，要求本城的衛兵在當天晚上將查理二世的臣民驅逐到他們的船上，這件事發生在1637年12月27日。第二天，約翰·芒特尼和羅賓森登岸向總督和這個城市提交了一份抗議書，“六個月以前的一天，他們曾將國王友好的信件交給他們”(79)。

作為歐洲通往中央帝國的唯一橋樑，澳門不準備向可能威脅其在遠東地位的任何國家打開大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多元文化的舞臺的澳門從來就是一個見證不同民族、習俗和宗教之間差異的得天

獨厚的地方。對另類的經驗主義的發現是多方位的，並且來源於有情感的觀察，以一種客觀的方式是難以獲得的，這個過程被托多羅夫（Todorov）稱為“exotopia”，即“伴隨有主觀認識的另類的外在性表述”⁽⁸⁰⁾。異國情調出現於能夠體現文明化的我——另類的你這兩者之間差別的空間奧秘中，作為研究的客體，它要求學科間的包容性，而這種包容具有極其複雜的特性，它以人類在地理和想象的旅行中積累的經驗為基礎並反映每一種文明與眾不同的形象，在17世紀時，相對於澳門的文化和政治環境而言的歐洲（基督徒）的情況便屬此例。實際的或想象中的但總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旅行圍繞妖神話和表演進行，其時間、地點和來往於葡萄牙飛地的人物經常發生着變化。

作為變化性的美學的烙印和標誌在孟迪日記中的體現，我們可以開列出一個專有名詞的完整清單，地名、修飾語、聲音的表達和模倣、中國葡萄牙和日本語言文字的轉抄，以及能將讀者帶到一個與自己不同的語義學世界的其它內容，在這裡，有服裝、相貌，有別具一格的舉止和物品。於是，異域的描述可以起到對現實進行比喻或類比的作用。同時，當所有這些題材和象徵形象在作者的旅行日記中建立起來並被不斷使用的時候，便可以幫助讀者去理解甚至走向他“期望中的地平線”⁽⁸¹⁾。在澳門，另類事物通過一個幾近找到的世界中的規則（發現或）掩蓋著，而這個世界要用美學方法和專門語言才能表現。對於文字 - 象徵形象，一本日記的編寫同樣可用來整理思想並提出對人類整體的更為深刻的認識，而其他英國的航海家們從這樣的旅行中（學會或）懂得了這些基本事實和知識以便在未來與葡萄牙人或這些充滿了無數商機的新世界的本地人進行接觸。我們見到的日記還具有另外的特別價值，那就是它以其獨特和完整的方式傳達出他所感受到的文明氛圍，正如沃爾夫對日記所下的定義那樣：“一個寬大的百寶囊，一個人在這裡留下零星雜物。”（1919年4月20日）⁽⁸²⁾因此，從外交、經濟、文化和宗教等方面來說，孟迪的記錄對於研究澳門歷史和英國 - 葡萄牙在遠東的關係都是

基本的和唯一的來源。對於後者來說，這份文獻中重要的對人的描述具有較重要的人類學研究價值，而對同時代其它文獻的閱讀，例如安東尼奧·博卡羅（1635）的作品和馬可·達瓦羅（1638）的作品可以成為對它的補充。日記通過叙述者的眼睛揭示微觀世界，常常以其真實可靠性而成為極好的歷史資料來源⁽⁸³⁾，因而具有了特殊的價值和地位，儘管是從來自歐洲的局外人的觀點看，它不過是17世紀澳門——根據馬可·達瓦羅所說，澳門是“印度葡萄牙領地中最好、最有力和最有利可圖的，我曾經到過它們之中的大部分”⁽⁸⁴⁾——日常生活的現實寫照。但是，英國人的記錄反映了這個地區輝煌時代的結束，因為與長崎利益豐厚的貿易在經歷了若干年的緊張關係之後走到了盡頭；1648年這個城市發生的饑荒影響了近四萬居民；最後，在60年代，滿清進攻中國南方的時候，大部分中國居民被迫離開了這個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奮鬥的飛地。⁽⁸⁵⁾

【註】

- (1) 在安東尼奧·博卡羅描寫澳門的1635年，一艘英國的雙桅船“倫敦號”抵達澳門，這使得中國當局對准許“紅夷”入城的葡萄牙人進行罰款，事實上，這件事也將影響後來當威爾船長的船隊到來時所採取的措施。見奧斯汀·科茨，《澳門和英國（1637-1842）：前往香港的序幕》，頁7和頁28。這位作者在他的著作《澳門：歷史的通道》頁24說，蘇格蘭人威廉·卡邁克爾（William Carmichael）於1581年自里斯本出發前往果阿，並訪問了澳門，“因此成為有案可查的第一位來到中國的英國人和瞭解早期澳門的極少數人中的一位”。當理查德·弗羅比歇（Richard Frobisher）在妻子簡、兩個孩子和女僕朱迪絲的陪伴下乘船前往日本途中遭遇沉船而來到澳門時，這裡的當局像對待孟迪的船員們那樣極力使他們離開日本或中國。“據認為，簡·卡邁克爾和朱迪絲是最早到達中國的英國婦女”（同書頁88）。朱迪絲改名為朱利亞並在澳門定居，與一位後來到馬六甲海關工作的澳門土生結婚，孟迪遇見了她：“5月24日。我們在去馬六甲的路上下了錨，鳴禮炮向城市致意。（……）船長是一位英國人，很久前離開了公司的一艘船並與一個葡萄牙混血女人結婚。這裡還有一個英國女人，她同一個有些素質的葡萄牙混血兒結了婚，並生了一個漂亮的兒子。她於十八或十九年前乘“獨角獸號”（Unicorn）從英國來到這裡，當時是一個名叫弗羅比歇的海軍上尉及其家屬的女傭。在經過了一些事情之後，她與一個葡萄牙人交上了朋友並與這個在海關工作的人結了婚，她將自己的名字朱迪絲改為朱利亞·德·拉

- 格羅西亞。(彼得·孟迪,《1597-1667彼得·孟迪遊記》,約翰·基特(出版))。
- (2) 見卡洛斯·亞歷山大·德·莫拉伊,《1498-1962葡屬印度編年史》,頁98。關於由蘇拉特商站董事長威廉·梅斯沃德(William Methwold)簽署的《果阿協議》(Convenção de Goa),可參閱約翰·凱伊的《光榮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史》,頁108、117、121-122和131。
- (3) 見約翰·凱伊,《光榮公司》,頁121。
- (4) 據查爾斯·博克塞,《復興時期的澳門/三百年前的澳門》,頁51,英國船隊於1637年7月5日抵達澳門。在進入城市之前,船隊在澳門附近的島嶼可能停留了八天。
- (5) 科提恩和恩迪米恩·波特(Endymion Porter)一起於1637年獲得了英國國王查理二世的批准,以便在東印度公司的船隊已經訪問過的東印度地區開展貿易活動(見菲利普·勞森,《東印度公司:歷史》,頁34)。但是,在此之前若干年,科提恩和他的船長們已經在印度洋與葡萄牙的至高無上的權威進行較量。關於這一點,見桑賈伊·蘇布拉馬亞姆,《英國插手印度(1604-1623)》,荷蘭人對摩鹿加群島的進攻;約翰·凱伊,同上,頁120-124。
- (6) 彼得·孟迪出生在康沃爾郡的彭股一個商人家庭。約翰·基特(出版),《1597-1667彼得·孟迪的旅行》,在第1和第2頁分別有這樣的描述:“他(彼得·孟迪)受過相當良好的教育,並且曾越過海峽去學習法語。後來,為了實現周遊世界的理想,他還到過西班牙。(……)奇怪的是,生活在彼得·孟迪之後並不太長時間的康沃爾郡人、歷史學家哈爾斯(Hals)不曾提及他,倒是湯金(Tonkin)在他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做了最早的記錄,他指出我們的旅行家是彭股的理查德·孟迪(Richard Mundy)先生的兒子。(……)這似乎表明,彼得·孟迪是在1667年和1670年期間的某個時間去世的……”奧斯汀·科茨在《澳門和英國》頁1這樣寫道:“(彼得·孟迪是)旅行最多的英國人之一……”
- (7) 由理查德·卡納克·坦普爾和L·安斯蒂出版,書名為《1608-1667彼得·孟迪的旅行》,五卷,哈克盧特公司,倫敦,1907-1936。關於這個文獻來源,特別是關於葡屬居住地的日本僑民的代表,可參閱澳門文化雜誌將刊登的我們的文章〈(1637)彼得·孟迪遊記中日本和澳門形象及其代表〉;〈(1637)彼得·孟迪遊記中澳門的多元文化面貌〉;〈英國文學中的澳門形象〉。
- (8) 這段描述(“1637年彼得·孟迪關於澳門的描述”)由查爾斯·博克塞翻譯,見上述著作頁51-75,轉引自R.C.坦普爾和L.安斯蒂出版的著作,見上述著作頁159-316。原稿現存於博德利圖書館,牛津大學。(Rawlinson MS. A315)。
- (9) 日記作者列舉了各種自己認為非同一般的特點,系統地記錄了事件和生活,“日記的獨特性首先表現是夾泥夾議,(……)泥述的過程中加入了作者每天經歷的歷史。”(見卡洛斯·雷伊斯和安娜·克里斯蒂納·M·洛佩斯,《記事方法辭典》,頁105)。羅伯特·A·福瑟吉爾在《個人編年史:英國日記研究》頁11指出,日記應當“被看作是在一系列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下從個人的角度‘感知’——思考歷史而作的表述”。威廉·馬修斯在《注釋本英國日記錄》第XV頁指出,“(日記是)記日記的人對感興趣的東西所作的個人記錄,它常常是逐日記錄的,這些每日記錄獨立成篇並記錄下剛剛發生的事件,它的風格常常是自由的,而不是經過組織的語言”。根據福瑟吉爾的定義,我們可以把彼得·孟迪的日記界定為“個人記錄的報紙”。(頁17)
- (10) 見彼得·孟迪上述著作,頁62。這是中國人對那些長髮“紅毛”的英國商人和旅行家的稱呼。根據霍齊亞·巴盧·莫爾斯,《1635-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頁21第1項,“中文‘紅毛’一詞的含義指從成熟的小麥到熟透的栗子包括朱砂色在內的所有顏色,用這些顏色表示陰間。”
- (11) 見霍齊亞·巴盧·莫爾斯,《1635-1834年東印度公司與中國貿易編年史》,頁16-17。
- (12) 幾乎是在其對澳門描述的最後部分(第67頁),孟迪告訴讀者耶穌會修士有一處財產:“面對大海的地方有一個很大的建築群,那裡的建築像錶盤似的圍成半月形。城市的裡邊有一個被稱為綠島或青洲的礁石島,這片地方屬於聖保祿的神父或耶穌會修士們……”這片財產和作者記錄的其他屬於教會的財產都反映出16和17世紀耶穌會修士在這個城市的重要地位和影響。
- (13) 彼得·孟迪,上述著作,頁13。據查爾斯·博克塞說,《澳門……》,頁46,1635年到過澳門的博恩福德(Bornford)船長也曾提到,葡萄牙人對英國人“很有禮貌而且隨和”。安東尼奧·博卡羅在談到澳門時(見博克塞,《澳門……》,頁46)曾提到過馬卡薩和澳門之間的旅行,在這些旅行中,商人們與“英國人、丹麥人……”做生意。
- (14) 見彼得·孟迪,同上著作,頁66。
- (15) 見彼得·孟迪,同上著作,頁67。
- (16) 關於炮臺內的情況,見加斯唐·德·梅洛·德·馬托斯,“炮臺”。
- (17) 關於這件事情,特別是關於澳門與日本之間的貿易,請看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科斯塔,〈葡萄牙人在中國〉;同作者,〈葡萄牙人在日本〉和〈基督使團在中國和日本〉;同作者,《葡萄牙和日本:南蠻世紀》;同作者,〈日本〉;同作者,《葡萄牙人對日本文明的發現》;同作者,〈16世紀和17世紀的澳門和日本〉;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科斯塔和安娜·費爾南德斯·平托,《(1594-1627)澳門學院的年報》;路易斯·菲利普·托馬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群島海域〉;《南蠻槍:葡萄牙人在日本》;阿爾杜爾·特奧多羅·德·馬托斯,〈日本航線、澳門和葡萄牙與東方的貿易〉;瓦爾德馬·費爾南多·達·席爾瓦·科蒂紐,《(1639)葡萄牙在日本存在的結束》;C.A.蒙塔爾托·德·熱蘇斯,《歷史上的澳門:新舊中國的國際性》,頁20-1;若熱·曼努埃爾·弗羅雷斯,〈日本的

“發現”）；查爾斯·博克塞，《日本的基督世紀》；同作者，《1550-1770紳士在遠東》；同作者，《澳門來的大船》；喬治·布賴恩·德·索薩，《帝國的倖存：葡萄牙人在中國》。

- (18) 威德爾一面與葡萄牙和中國當局進行殊力量的較量，一面為了商業利益通過各種策略企圖到廣州去。“他（威德爾）被不斷收到的關於葡萄牙人在廣州煽動中國人產生更大的敵意的報告所激怒（……）。威德爾是在西班牙國王的建議下並得到了葡屬印度總督簽署的一個協約後來到澳門的；因此，他懇請澳門總督考慮其利益；儘管如此，威德爾仍然和他的軍官們商量‘留在這裡或者離開它到廣州去到底哪個方案更好？’。”（見霍齊亞·巴盧·莫爾斯，《1635-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頁22和頁24）。事實上，威德爾甚至還“提出了一個將來進入中國從事貿易的建議，與此同時，他還建議考慮佔領海南島作為英國的領地”。（見同作者的同一著作頁27）。“……威德爾正是準備利用葡萄牙人方面的大門，準備放下架子敲開這個大門，如果這扇大門在他面前關閉的話。在此之前，他已經在東印度公司工作了許多年，而且在1627年他的這個意見在巴達維亞總督致公司領導層的一份關於開展對華貿易的備忘錄所採納。備忘錄是這樣開頭的：‘開展對華貿易，有三件事情應特別讓世界瞭解。第一，它可以帶來大量的貿易。第二，不將他們視為進入他們國家的外國人。第三，視貿易為普通人的生活，不論多么遙遠的地方、不論有多少風險，他們都將到達並居住在那裡’。”（同作者的同著作頁29）
- (19) 見彼得·孟迪，上述著作，頁57。
- (20) 在關於澳門的最後部分，作者還提到日本皇帝對歐洲和本地基督徒的迫害，描述了“殘酷的法律”和在那個群島發生的恐慌（頁69）。在澳門有許多被流放的日本基督徒，他們對這裡的生活特別是在服裝方面產生了影響。
- (21) 關於威德爾船隊的其他著述，可見福斯特（Foster），《1634-1644年英國商站在印度》（*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34-1644*），二卷，牛津，1911-12；H. B. 莫爾斯，《1635-1834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第一卷。
- (22)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著作，頁73：“你可以完整地瞭解到在漫長旅途中的珀切斯。”約翰·基特（出版社），《1597-1667彼得·孟迪的旅行》，關於這部日記的流行和寫作目的，孟迪本人說：“（他的日記）可以在他的家人和朋友中傳閱——使這些希望瞭解外國情況的朋友們高興。”英國旅行家在文中使用了賀拉斯理論：“詩人或者希望成為有用的人，或者愉悅他人，或者以生活為基礎描寫美好的事物。”（見賀拉斯，《詩的藝術》，頁105）。根據孟迪所說，我們可以看到日記的某些片段接近書信體，促述者是以書信體的方式寫給專門物件的。關於日記的專門讀者，哈瑞·伯洛蓋特，《女性的世紀》，頁8：“對於讀者，時斷時續對於日記這種形式來說是正常的，並且使得每一部日記具有了與小說的時斷時續或遊戲一樣的緊張感。然而，沒有條理性，日記也不會吸引人。讀者希望讀到並發現整個事件、過程、結果，嫉迷於日記所能提供的一切”。關於這個問題，可參閱J·魯塞，〈心靈日記和無收件人的文字？〉；M·考爾-格魯伯，〈心靈日記和文字的收件人〉；S·E·卡格勒，〈日記藝術：一個新評價〉；B·迪迪耶，《心靈日記》。
- (23) 關於達尼爾·笛福（Daniel Defoe）的著作中談到澳門的情況，見我們的文章：〈十八世紀英國文學中的葡萄牙航海家形象：在葡萄牙航海路線上的羅賓遜·克魯索、辛格爾頓船長和格利弗〉。
- (24) 見我們的詞條“Exotismo”，卡洛斯·塞亞，《文學辭典》，Editorial Verbo，正在印刷。
- (25) 見愛德華·賽伊德。
- (26) 在頁72，孟迪談到去澳門城外散步，在散步中，見到了一些墓穴，它們與“土耳其人”的墓穴相象。
- (27)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3，本文作者注黑體字。
- (28)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6。關於旅行的發現/文學和自然歷史，見費爾南多·克里斯托旺，〈遊記文學和自然歷史〉。
- (29)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1。
- (30) 關於這一點，請看我們的文章〈《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的變化性的意義〉。
- (31)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3，本文作者注黑體字。
- (32)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4，本文作者注黑體字。
- (33) 據查爾斯·博克塞，《澳門……》，頁56，1637年的日本艦隊在船長堂·弗朗西斯科·德·卡斯楚·布蘭科的統帥下有六隻帆槳船。
- (34)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5-56。
- (35) 維克多·賽加倫所用的說法，《關於異國情調的論文》，頁41。
- (36)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6。
- (37)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5。
- (38)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7。儘管從來也沒有到過澳門，安東尼奧·博卡羅卻指出這個城市與日本貿易的重要性，提出了比彼得·孟迪更加全面的關於貿易活動的觀點，因為作為一個生活在果阿的葡萄牙人，博卡羅享有收集有關澳門資料和資訊的特權：“這個上帝聖名之城的旅行主要嫉眼於去日本的旅行，四艘裝載各種絲綢的船開往那裡，去需十或十二天，返回需八或十天，其間在日本大約一個月。在所有的貨物中，除了絲綢之外，有許多金子、中國的木料，用以換取日本盛產的銀、銅、許多樟腦和許多比中國的好得多的日本金飾物……”（安東尼奧·博卡羅，〈1635年澳門的記錄〉，見查爾斯·博克塞，《澳門……》，頁40）。
- (39) 據博克塞，《澳門……》，頁59，這位神父就是1622年在日本的基督教牧師阿爾杜爾·阿奇（Arthur Hatch，1593-1639）。

- (40) 瑪利亞·埃倫娜·門德斯·平托在《南蠻屏風/南蠻屏風》第5-6頁指出：“日本屏風的特點是它由兩部分組成，它與其他屏風一起確定重要性不同的空間，而其實用性大於裝飾性。在8世紀，屏風被從中國直接或經過中國影響佔優勢的朝鮮帶到日本，它們開始成為日本生活的組成部分”。
- (41)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59-60。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作者使用了形容詞“奇異的”，這再次表明了作者對異域景觀/中國人所感到的吃驚和嫉迷。這些在後來成為歐洲的時髦(chinoiseries)。
- (42)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1。
- (43)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0。英國人的味覺器官喜歡澳門的異域烹飪方法。關於此類內容，奧斯汀·科茨在《澳門：歷史的通道》頁61這樣說到：“在澳門的訪問中，彼得·孟迪提到為他們舉行的有音樂助興的一次晚餐，並說音樂‘同樣好’。與果阿相反，這個城市沒有發展起自己的音樂傳統，而中國人對歐洲音樂不感興趣。最好的曲子與宗教相關，甚至在修道院裡建立一個類似音樂學院的（似乎很好的）機構，它的最優秀的學生中有一些是日本人。
- (44)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1。
- (45) 作者特別提到“Mandarin”這個從葡萄牙語引入英語的詞的詞源。見若熱·莫拉伊-巴博薩，《葡萄牙語在世界》，頁134。
- (46) 實際上，獅子是在中國文化中（界定）確定地位的具有象徵/代表意義的動物，例如在舞蹈中和寺廟的門上。見漢斯·比德曼，《華茲沃茲象徵主義詞典》，頁210；讓·舍瓦利耶·海爾伯蘭茲，《象徵詞辭典》，頁576-577。
- (47)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0。
- (48)(49)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1。
- (50)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1-62。
- (51)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3。
- (52)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4。在同一頁，英國旅行家向讀者介紹了中國人賣子的習俗，許多到過中央帝國的其他歐洲旅行家都曾提到過這個現象。
- (53) 見馬可·達瓦羅，〈1638年的澳門〉，查爾斯·博克塞在《澳門……》頁84這樣寫道：“葡萄牙人與中國婦女結婚，因此定居下來”。
- (54) 見N·C·馬蒂厄，“性（的區別）”：“每個社會都制定一個關於性的法則（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的法則都很殘酷地強加給男性和女性），但這個規則——無論是理想的或祇重事實的——有時超越了生物學角度的‘證據’。所以說，‘社會的性’或‘屬性’的概念，用於分析性的社會分別，便成為有用”。唐納·J·哈拉威在《女權主義和技術科學》第28和30頁也說：“類型經常表現為一種關係，而不是通過民族、出身、階級、年齡、膚色或其他（……）來給一個人劃定等級或地位。（……）類型和種族從來都不是獨立存在的、（……）缺乏男子氣是不禮貌的（……）：這些比喻在將那些作為常識彙集在一起的法律中非常重要”。
- (55)(56)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3。
- (57) 據查爾斯·博克塞，《澳門……》，頁64，安東尼奧·阿拉尼亞（António Aranha）是1929年日本之行的船長並在那裡居住了兩年。
- (58)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3。
- (59) 在遠東，英國人的故鄉是比較而言的，是與旅行者在自己的旅途中遇到的最好和最不同的地方進行比較而言的，他們所謂最好的那些事物中的一部分可能言過其實。這種說法很能代表英國旅行家的想法，他將自己所處的社會置於在旅行所提供和要求的運動和認識過程中接觸到的所有社會之上。見馬利亞·阿爾西亞·塞舒，〈關係與促述：為了旅行談話的理論。瓦斯科·達·伽馬對印度遠征的見證的分析〉，第14頁：“……旅行文字是一個模糊的文學領域，它是一個‘no man's land’，因為旅行涉及到運動，或者確切地說，涉及到從一處到另一處的轉移……”
- (60)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4。
- (61)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3。
- (62) 珀切斯（1575-1626），英國歷史學家和遊記作家，曾是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的助手，出版有《珀切斯的朝聖之路，或世界關係和各時期宗教（1613）》（*Purchas His Pilgrimage, or, 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1613）），《珀切斯的朝聖之路：微觀世界，或人的歷史（1619）》（*Purchas His Pilgrimage: Microcosmus, or, the Histories of Man*（1619））。還出版了編輯為《哈克盧特遺稿，或珀切斯的朝聖之路：世界歷史——英國人和其他人在海上和陸地的旅行》（*Hakluyt Posthumo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s: Contai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 Travels by Englishmen and Others*）（1625-1626：五卷）。最後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記錄了威廉·亞當在日本的生活，那裡曾經有一個英國商站一直存在到英國人於1623年撤出那個群島。（見楊·奧斯比（出版），《華茲華斯英語文學必讀》，頁755）。
- (63) 見查爾斯·博克塞，《澳門……》，頁68。
- (64)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7-68。
- (65)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5。
- (66)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分別見頁65-66。異國情調再次出現在書中，在此，孟迪將遊戲者的服裝比作“野蠻的摩爾人”和“基督徒”的服裝，“每人都有自己的黑人或卡菲爾人”，遊戲的雙方互為對手。在描述中，服裝再次具有了強烈的象徵意義。在書中，作者還對澳門“快速而勇敢”的馬和另一些英國馬 *Cornish Nagges* 進行了比較。
- (67)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分別見頁66-67。
- (68)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2。
- (69)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67。
- (70)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0。
- (71)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0-71。

- (72) 見若熱·M·多斯·桑托斯，參閱〈澳門〉；拉法埃爾·阿維拉·德·阿塞維多，《葡萄牙文化影響在澳門》，頁13-26。
- (73) 戲劇（清唱劇）被耶穌會修士們當作教義問答以及教化和娛樂工具。
- (74)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1。
- (75) 關於17世紀導致英葡達成諒解在馬六甲海峽抵抗荷蘭印度公司的記錄，可見馬庫斯·P·M·文克，〈友善的瞭解——荷蘭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運輸業在馬六甲海峽（1641-1663）〉。
- (76)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4。據博克塞，在同一頁的註腳中，澳門總督多明我的這份公告在澳門公佈於1637年10月29日，它沒有被正確地闡述而執行情況更糟糕，正像孟迪記錄那樣。在那些不想放棄登上一艘英國船（以此避免荷蘭人對馬六甲海峽的封鎖）的機會的人中間就有堂·貢薩洛·達·西爾維拉（Dom Gonçalo da Silveira）。
- (77)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5。
- (78) 同前，同上述作品。“Choppes”指中國用來頒佈法令的公文。
- (79) 見彼得·孟迪，同上述作品，頁75。查理二世的信是在1635年12月12日被“皇家委員會”交給威德爾到“東印度從事貿易”。見霍齊亞·巴盧·莫爾斯，同上述作品，第16頁：“在這個日期下寫著：（……）5° 致果阿葡萄牙總督和澳門總督”。這個戰略不但表明了與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結盟的葡萄牙人在東方的政權和至高無上的權力，還表明了這個行動具有精心策劃的性質。
- (80) 見采萬·托多羅夫，《征服美洲：另類的問題》，頁254。
- (81) 見沃爾夫岡·伊塞爾，《閱讀的行為：美學反應的理論》，頁99。
- (82) 見沃爾夫，〈沃爾夫日記1915-1941〉，第一卷，頁266。尼恩在《未來的小說》頁142已經將日記定義為“溝通的渠道”。
- (83) 見羅伯特·福瑟吉爾，《個人編年史：英國日記研究》，頁40頁。還可見〈自我表達〉一章，頁99-152。
- (84) 見馬可·達瓦羅，〈1638年澳門的描述〉，見查爾斯·博克塞，《澳門……》，頁89。
- (85) 見小約翰·E·威爾斯，〈澳門的殘存，1640-1720〉。

【參考文獻】

一、主要書目

孟迪，彼得——〈1637年彼得·孟迪關於澳門的描述〉，見查爾斯·博克塞（Charles Boxer），《復興時期的澳門/三百年前的澳門》（*Macau na Época de Restauração / 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1942年澳門官印局複製出版，《查爾斯·博克塞全集》（*Obra Completa de Charles Ralph Boxer*），第二卷，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年，

頁49-75。

孟迪，彼得——《1608-1667彼得·孟迪的旅行》（*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1608-1667*），理查德·卡納克·坦普爾（Richard Carnac Temple）和L·安斯蒂（L. Anstey）撰寫序言、注釋和摘抄，五卷，倫敦：Hakluyt Society，1907-1936。

孟迪，彼得——《1597-1667彼得·孟迪的旅行》（*The Travels of Peter Mundy 1597-1667*），約翰·基特（John Keast）作序言、評介和文字處理。雷德魯斯：Dyllanson Truran，1984。

二、輔助書目

阿爾維斯，若熱·M·多斯·桑托斯（Jorge M. dos Santos Alves）——〈澳門〉，見卡洛斯·莫雷拉·阿澤維多（Carlos Moreira Azevedo），《葡萄牙宗教史辭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Religiosa de Portugal*），J-P卷。里斯本：Círculo de Leitores，2001，頁159-163。

達瓦羅，馬可——〈1638年的澳門〉，查爾斯·博克塞·查爾斯·博克塞，《復興時期的澳門/三百年前的澳門》，1942年澳門官印局複製出版，“查爾斯·博克塞全集”，第二卷，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年，頁78-89。

阿塞維多，拉法埃爾·阿維拉·德（Rafael Ávila de Azevedo）——《葡萄牙文化影響在澳門》（*A Influência da Cultura Portuguesa em Macau*），《精選書庫》。里斯本：葡萄牙語言文化學會，1984。

比德曼，漢斯（Hans Biederman）——《華茲沃茲象徵主義詞典》（*The Wordsworth Dictionary of Symbolism*）。韋爾：Wordsworth Editions，1992。

伯洛蓋特，哈瑞——《女性的世紀：英國婦女的私人日記》。格洛斯特：Alan Sutton，1989。

博卡羅，安東尼奧——〈1635年澳門的記錄〉，查爾斯·博克塞，《復興時期的澳門/三百年前的澳門》，1942年澳門官印局複製出版，《查爾斯·博克塞全集》，第二卷，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年，頁19-47。

博克塞，查爾斯——《日本的基督世紀》（*The Christian Century in Japan*）。伯克利-洛杉磯：Carcanet Press，1967。

博克塞，查爾斯——《1550-1770紳士在遠東》（*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倫敦：牛津大學出版社，1968。

博克塞，查爾斯——《復興時期的澳門/三百年前的澳門》，1942年澳門官印局複製出版，《查爾斯·博克塞全集》，第二卷，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3年。

博克塞，查爾斯——《澳門來的大船》（*The Great Ship of Amacon*）。澳門：東方基金會-澳門海事博物館研究中心，1988。

考爾-格魯伯，M（M. Calle-Gruber）——〈心靈日記和文字的收件人〉，《詩集》（*Poétique*），第59卷，頁389-391。

- 舍瓦利耶，讓·舍瓦利耶·海爾伯蘭茲，阿蘭 (Jean Chevalier Gheerbrandt) ——《象徵詞辭典》(*Dictionnaire des Symboles*)。巴黎：Robert Laffont/Jupiter, 1993。
- 科茨，奧斯汀——《澳門和英國 (1637—1842)：前往香港的序幕》(*Macao and the British (1637-1842): Prelude to Hong Kong*)。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89[1966]。
- 科茨，奧斯汀——《澳門：歷史的通道》(*Calçadas da História*)，路易莎·格德斯 (Luísa Guedes) 翻譯。里斯本：澳門文化司署 - Gradiva, 1991。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 (João Paulo Oliveira e Costa) ——《葡萄牙人對日本文明的發現》(*A Descoberta da Civilização Japonesa pelos Portugueses*)。澳門：澳門文化司署 - 海外歷史學會，1995。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基督使團在中國和日本〉，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 (Luís de Albuquerque)，《葡萄牙在世界》(*Portugal no Mundo*)，第三卷，里斯本：Publicações Alfa, 1989，頁143-157。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日本〉，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葡萄牙發現事業歷史辭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os Descobrimentos Portugueses*)，第一卷，里斯本：Editorial Caminho, 1994，頁537-541。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16世紀和17世紀的澳門和日本〉，《澳門》雜誌，第二系列，第67期，1997年11月。澳門，頁190-197。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葡萄牙人在中國〉，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葡萄牙在世界》，第四卷。里斯本：Publicações Alfa, 1989，頁180-196。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葡萄牙人在日本〉，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葡萄牙在世界》，第四卷。里斯本：Publicações Alfa, 1989，頁197-211。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葡萄牙和日本：南蠻世紀》(*Portugal and the Japan: The Namban Century*)。里斯本：Portuguese State Mint, 1993。
- 科斯塔，若奧·保羅·奧利維拉·埃；安娜·費爾南德斯·平托 (Ana Fernandes Pinto) ——《(1594 - 1627) 澳門學院的年報》(*Cartas Anuas do Colégio de Macau (1594-1627)*)。澳門：紀念葡萄牙發現事業澳門地區委員會-澳門基金會，1999。
- 科蒂紐，瓦爾德馬·費爾南多·達·席爾瓦 (Valdemar Fernando da Silva Coutinho) ——《(1639) 葡萄牙在日本存在的結束》(*O Fim da Presença Portuguesa no Japão (1639)*)。里斯本：S.H.I.P., 1999。
- 克里斯托旺，費爾南多 (Fernando Cristóvão) ——〈遊記文學和自然歷史〉，見費爾南多·克里斯托旺，《遊記文學的文化制約因素：研究與書目》(*Condicionantes Culturais da Literatura de Viagens: Estudos e Bibliografias*)。里斯本：Edições Cosmos-C.L.E.P.U.L., 1999，頁185-218。
- 迪迪耶，B (B. Didier) ——《心靈日記》(*Le Journal Intime*)。巴黎：P.U.F., 1976。
- 弗羅雷斯，若熱·曼努埃爾 (Jorge Manuel Flores) ——〈日本的“發現”〉，見《文化雜誌》，第17期。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3，頁5-16。
- 福瑟吉爾，羅伯特·A (Robert A. Fothergill) ——《個人編年史：英國日記研究》(*Private Chronicles: a Study of English Diaries*)。牛津：牛津大學出版社，1974。
- 哈拉威，唐納·J (Donna J. Haraway) ——《女權主義和技術科學》(*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倫敦：Routledge, 1997。
- 賀拉斯 (Horácio) ——《詩的藝術》(*Arte Poética*)， “Inquérito典籍系列”，R·M·羅薩多·費爾南德斯做序言、翻譯及評介。里斯本：Editorial Inquérito, 1984。
- 伊塞爾，沃爾夫岡 (Wolfgang Iser) ——《閱讀的行為：美學反應的理論》(*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巴爾的摩：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80。
- 熱蘇斯，C·A·，蒙塔爾托·德 (C. A. Montalto de Jesus) ——《歷史上的澳門：新舊中國的國際性》(*Historic Macao: International Traits in China Old and New*)，第二版。澳門：Salesian Printing Press 和Tipografia Mercantil, 1926 (1902)。
- 卡格勒，S·E (S. E. Kagle) ——〈日記藝術：一個新評價〉，見《體裁》(*Genre*)，第六卷，4，1973，頁416-427。
- 凱伊，約翰 (John Keay) ——《光榮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史》(*Honourable Compan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倫敦：Harper Collins, 1993。
- 勞森，菲利普 (Philip Lawson) ——《東印度公司：歷史》(*The East India Company: A History*)。倫敦：Longman 1998。
- 馬修斯，威廉 (William Mathews) ——《1442年和1942年間注釋本英國日記錄》(*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 British Diaries Written Between 1442 and 1942*)。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50。
- 馬蒂厄，N·C (N. C. Mathieu) ——〈性(的區別)〉(*Sexes (différenciation des)*)，見皮埃爾·布龍特 (Pierre Bronte) 和米歇爾·伊扎德 (Michel Izard)，《民族學和人種學辭典》(*Dictionnaire de l'Ethnologie et de l'Anthropologie*)，巴黎：P.U.F., 1992，頁600。
- 馬托斯，阿爾杜爾·特奧多羅·德 (Artur Teodoro de Matos) ——“日本航線、澳門和葡萄牙與東方的貿易”，見《澳門》雜誌，第二系列，第83期，1999年3月。澳門，頁86-91。
- 馬托斯，加斯唐·德·梅洛·德 (Gastão de Mello de Matos) ——〈炮臺〉，見若埃爾·塞朗 (Joel Serrão)，《葡萄牙歷史辭典》(*Dicionário de História de Portugal*)，第四

- 卷·波爾圖：Figueirinhas，頁409-412。
- 莫拉伊斯，卡洛斯·亞歷山大·德（Carlos Alexandre de Morais）——《1498 - 1962 葡屬印度編年史》（*Cronologia Geral da Índia Portuguesa 1498-1962*）。里斯本：Editorial Estampa，1997。
- 莫拉伊斯-巴博薩，若熱（Jorge Morais-Barbosa）——《葡萄牙語在世界》（*A Língua Portuguesa no Mundo*）。里斯本：海外總局（*Agência Geral do Ultramar*），1969。
- 莫爾斯，霍齊亞·巴盧（Hosea Ballou Morse）——《1635-1834 年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第一卷，牛津：Clarendon Press，1969。
- 尼恩（Anais Nin）——《未來的小說》（*The Novel of the Future*）。倫敦：Peter Owen，1969。
- 奧斯比，楊·（Ian Ousby，出版）——《華茲華斯英語文學必讀》（*The Wordsworth Companion to Literature in English*）。韋爾：Wordsworth Editions Ltd，1994。
- 平托，瑪利亞·埃倫娜·門德斯（Maria Helena Mendes Pinto）——《南蠻屏風/南蠻屏風》（*Biombos Namban/Namban Screens*）。里斯本：古代藝術國家博物館，1993。
- 普卡，羅熱里奧——〈異國情調〉，見卡洛斯·塞亞（Carlos Ceia），《文學辭典》（*Dicionário de Termos Literários*），Editorial Verbo，（正在印刷）。
- 普卡，羅熱里奧——〈《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的變化性的意義〉，見《Lucero》雜誌：《伊比利亞語和拉丁語研究日記》（*A Journal of Iberian and Latin Studies*）。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2001年5月，頁73-80。根據原文做若干修改後的文章：〈《盧濟塔尼亞人之歌》中與異國情調相對應的另類美學〉，見《比較文學歷史》：國際研討會，葡萄牙天主教大學，1999年11月11、12日。里斯本：Edições Colibri——葡萄牙巴西文學和文化中心，2001，第261-274頁。
- 普卡，羅熱里奧——〈英國文學中的澳門形象〉，見《第一屆英葡研究國際大會紀要》，2001年5月6日至8日舉行，Culturgest-里斯本，英葡研究中心-F.C.S.H.，（正在印刷）。
- 普卡，羅熱里奧——〈《（1637年）彼得·孟迪遊記》中日本和澳門的形象與代表〉，見《葡萄牙人簡報/日本研究》（*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第一卷。里斯本：海外歷史中心-里斯本新大學，2000，頁97-109。
- 普卡，羅熱里奧——〈18世紀英國文學中的葡萄牙航海家形象：在葡萄牙航海路線上的羅賓遜·克魯索、辛格爾頓船長和格利弗〉，見《英葡研究雜誌》，第8期。里斯本：科學技術基金會-英葡研究中心/F.C.S.H-新大學，1999，頁47-79。
- 雷伊斯，卡洛斯（Carlos Reis）；安娜·克里斯蒂納·M·洛佩斯（Ana Cristina M. Lopes）——〈日記〉，見《叙事方法辭典》（*Dicionário de Narratologia*）。科英布拉：Livraria Almedina，1994，頁105-107。
- 魯塞，J（J. Rousset）——〈心靈日記和無收件人的文字？〉（*Le journal intime, texte sans destinataire?*），見《詩集》，第65期，1983，頁435-443。
- 賽伊德，愛德華——《東方主義》。哈蒙茲沃思：Penguin Books，1995[1978]。
- 賽加倫，維克多（Victor Segalen）——《關於異國情調的論文》（*Essai sur l'exotisme*）。巴黎：Le Livre de Poche，1999。
- 塞舒，馬利亞·阿爾西亞（Maria Alzira Seixo）——〈關係與促述：為了旅行談話的理論。瓦斯科·達·伽馬對印度遠征的見證的分析〉，見馬利亞·阿爾西亞·塞舒和格拉薩·阿布雷烏（Graça Abreu，組織），遊記：方式，歷史。里斯本：Edições Cosmos，1998，頁13-20。
- 索薩，喬治·布賴恩·德（George Bryan de Souza）——《帝國的倖存：葡萄牙人在中國（1630-1754）》（*A Sobrevivência do Império: os Portugueses na China (1630-1754)*）。里斯本：Publicações Dom Quixote，1991[1986]。
- 蘇布拉馬亞姆，桑賈伊（Sanjay Subrahmanyam）——〈英國插手印度（1604-1623），荷蘭人對摩鹿加群島的進攻〉，見路易斯·德·阿爾布克爾克，《葡萄牙在世界》，第五卷。里斯本：Publicações Alfa，1989，頁27-37。
- 托馬斯，路易斯·菲利普（Luís Filipe Thomaz）——〈16世紀葡萄牙人在群島海域〉，見《群島》，第18期。巴黎：C.N.R.S.，1979，頁105-125。
- 托馬斯，路易斯·菲利普——《南蠻檣：葡萄牙人在日本》（*Nanban Jin: os Portugueses no Japão*）。里斯本：C.T.T.，1993。
- 托多羅夫，采萬（Tzevan Todorov）——《征服美洲：另類的問題》（*La Conquête de l'Amérique: la question de l'autre*）。巴黎：Éditions du Seuil，1982。
- 文克，馬庫斯·P·M（Marcus P.M. Vink）——〈友善的瞭解——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葡萄牙運輸業在馬六甲海峽（1641-1663）〉，見《文化雜誌》，第13/14期。澳門，澳門文化司署，1991，頁289-309。
- 威爾斯，小約翰·E（John E. Wills, Jr.）——〈澳門的殘存，1640-1720〉，見若熱·M·多斯·桑托斯·阿爾維斯，《葡萄牙和中國》（*Portugal e a China*）：（16-19世紀）葡萄牙和中國關係史第二期培訓班會議。里斯本：東方基金會，1999，頁111-124。
- 沃爾夫（Virginia Woolf）——《沃爾夫日記1915-1941》（*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1915-1941*），第一卷，安妮·奧利維·貝爾（Anne Oliver Bell），第一卷。紐約：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77-1984。

蔚玲譯